



DZG

一部古代廉政建设的精华读本

动真格

中国历代肃贪廉政得失

迟双明◎编著

阐发古代廉政思想 分析各种举措得失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古代政治文明的结晶，也是新形势下我国廉政建设的重要资源。

肃贪廉政，历朝历代的治国方略
科学梳理，备受关注的多种举措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一部古代廉政建设的精华读本

动真格

中国历代肃贪廉政得失

迟双明◎编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动真格：中国历代肃贪廉政得失 / 迟双明编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640-8522-3

I. ①动… II. ①迟… III. ①廉政建设—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5679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20 印张

字 数 / 320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6.80 元

责任编辑 / 钟 博

文案编辑 / 钟 博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刷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PREFACE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出现了阶级和国家，公共权力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贪污腐败现象随之产生，并成为困扰着世界各国的一大顽症。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大国，自然也不例外。

纵观中华五千年历史，贪污腐败一直如影相随。贪官横行、腐败蔓延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抗争，最终将汇聚成引发王朝灭亡的各种矛盾的焦点。人们在回顾王朝灭亡的历史时，也往往将其与贪污腐败相联系。

为了解决贪污腐败问题，中国历代思想家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其思想光辉深刻影响着中外政治实践和学术理论；历代统治者为了王朝的长远利益和长治久安，均在肃贪廉政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当时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政治制度，改善了社会风气，推进了政治文明的进程。由此，在廉政思想、观念、制度等层面，留下了充裕的史料和宝贵的经验，显示了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和政治人物对中国社会的理想表达以及对肃贪廉政的设想和实践，孕育了丰富的廉政文化，为后世的廉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中国一代明君唐太宗说：“以古为鉴，可知兴替。”西班牙文学家塞万提斯在《堂·吉珂德》中也说：“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逸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政治文明的结晶，也是新形势下我国廉政建设的重要资源。





当然，古代廉政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必须认真总结，理性思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并赋予其新的内涵，这样才能更好地古为今用，从而寻求根治腐败问题的方法。为此，我们特别推出了《动真格——中国历代肃贪廉政得失》这本书。

本书深入研究了我国先秦时期至清朝末年的历史，从道德教化、平衡制约、强化考核、建立峻法、严厉惩制、养廉奖廉、言传身教、另类肃贪等九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历代肃贪廉政的理论和实践，是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一次全面、系统、科学的梳理和总结。本书注重挖掘和阐发古代廉政文化的思想价值，并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历代廉政建设的历史脉络和廉政思路，又剖析了隐藏在历史制度和历史事件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集条理性、逻辑性、实用性和趣味性为一体，是一部借鉴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不可多得的优秀读本。

编者

2014年2月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道德教化： 用“官德”教育筑起一道思想防线

1. 以“性善论”出发的道德教化 / 2
2. 廉政道德的第一要义是“廉耻”二字 / 5
3. 义利之辨对廉政建设的意义 / 10
4. 取之有道之外的淡泊名利教化 / 13
5. 勤政意识与廉洁奉公的关系 / 18
6. 克俭节用、限欲绝奢的道德观 / 22
7. 传统廉政文化对修身自省的强调 / 26
8.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廉政教材 / 30
9. 多种文学艺术形式的反腐宣传 / 33

第二章 严把入口： 设定合理的官场“准入”制度

1. 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 38





2. 把正直之人放在邪恶之人的上面 / 41
3.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任标准 / 45
4. 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察举制 / 49
5. 充实察举制的“九品中正制” / 53
6. 从“相马”到“赛马”的科举制 / 56
7. 防止徇私舞弊的保任连坐制 / 60
8.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 63
9. 笔试与面试二者不可偏废 / 67

第三章 平衡制约：

建立相互制衡的刚性约束机制

1. 分权而治，使多个臣下互相牵制 / 72
2. 皇权与相权之争对廉政的影响 / 76
3. 纠举贪腐的监督机制必不可少 / 80
4. 明朝之前的古代御史制度 / 83
5. 明清的最高监察机关——都察院 / 87
6. 与御史互为补充的“给事中” / 91
7. 古代谏官制度对皇权的制约 / 94
8. 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与机构 / 97
9. 古代回避制度对官吏的制约 / 100
10. 授权有度，防止大权旁落 / 103
11. 对宦官必须严加管理和制约 / 107

第四章 强化考核： 考核是廉政建设的有效方法之一

1. 整肃官员队伍先要严格考核 / 112
2. 以“试职”的方式对人进行考察 / 115
3. 秦汉官员考核的主要方法：上计 / 118
4. 隋唐时期考课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 121
5. 宋朝官吏考核制度的利弊得失 / 124
6. 明朝前半期的考满制和考察制 / 128
7. 加强官吏政绩考核的“考成法” / 131
8. 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清代考核制度 / 135
9. 通过亲自接触官员进行考察 / 139

第五章 建立峻法： 运用明确的法律管束各级官员

1. 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廉政立法 / 144
2. 先秦时期的廉政惩贪法律 / 147
3. 秦汉时期的廉政惩贪法律 / 150
4. 隋唐时期的廉政惩贪法律 / 153
5. 宋元时期的廉政惩贪法律 / 157
6. 明清时期的廉政惩贪法律 / 160
7. 历代司法机构的变革和发展 / 164
8. 加强法律教育，使官员知法懂法 / 168
9. 有法必依才能实现依法治国 / 172





第六章 严厉惩治： 对贪腐分子绝不能“心太软”

1. 对贪腐者宽仁不断，则必受其乱 / 178
2. 惩治奸佞是平息众怒的良药 / 181
3. 过度柔仁，将会让国家陷入混乱 / 184
4. 对贪官必须发现一个处理一个 / 188
5. 敢动真格，使贪官污吏望而止步 / 192
6. 严防贪官偷桃换李逃避重罚 / 196
7. 对违规的有功者也不能留情 / 199
8. 执法如山，不管其人是谁 / 202
9. 切实做到执法严明、不徇私情 / 207
10. 诛恶前要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 211

第七章 养廉奖廉： 不要把人往贪腐的路上“逼”

1. 官德不能脱离物质基础而存在 / 216
2. 俸禄过低是官员腐败的催化剂 / 219
3. 宋代官员禄制的“益俸”政策 / 223
4. “不误公、不累民”的养廉银制度 / 228
5. 古代的退休、住房和工作餐保障 / 232
6. 被历史所忽视的胥吏待遇问题 / 236
7. 表彰清官以倡导政治清明 / 239
8. 对清官廉吏大张旗鼓地宣传 / 243

第八章

言传身教：

统治者要修身养德并以身作则

1. “民本思想”和“为政以德” / 248
2. “德”与“仁”有强大的感召力 / 251
3. 君主往往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国风 / 255
4. 自己做到，就不怕别人做不到 / 258
5. 时刻自省，克服享乐的欲望 / 262
6. 以自身的勤勉来影响和督促臣下 / 265
7. 适时“罪己”以提升自己的形象 / 269
8. 管好家人是以身作则的延伸 / 272

第九章

另类肃贪：

中国古代反腐的“非常”之举

1. 在酒色的幌子下调查忠与奸 / 276
 2. “耳目”可发挥特殊的监察作用 / 278
 3. 用“告密”洞察下情、明辨忠奸 / 282
 4. 依据传闻立案纠劾的“风闻言事” / 287
 5. 设置举报箱，查处问题官员 / 291
 6. 中国古代越级告状的信访制度 / 293
 7. 实施残忍的酷刑惩戒贪官污吏 / 298
 8. 用酷吏“打黑除恶，强化治安” / 301
- 参考文献 / 307

第一章

道德教化： 用“官德”教育筑起一道思想防线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使人在思想上筑起精神长城，是廉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传统廉政文化一直高度重视官德问题，通过全面的道德教化，规范和指导着历代统治阶层——上至皇帝、诸侯，下至州、县小吏的从政之道。历史上一些爱民惠民、廉洁清正的清官的产生，与官德教育的影响、熏陶是分不开的。



1. 以“性善论”出发的道德教化

廉政思想

自古以来，各行各业都有自身的职业道德要求，而其中要求标准最高、最严、最受人们重视的则莫过于“师德”和“官德”两种。教师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培育者，自然要“高尚其德”才能“为人师表”。而官吏则是国家机器的运转者，其道德素质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权的安危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所以说官职“授有德则国安，授无德则国乱”。

“官德”的提高需要进行道德教化，而道德教化能起作用的重要依据则是“性善论”。孔子和孟子提倡的人性论其实就是“性善论”，主要包括性善、向善、为善等主要环节，主张通过修养使人向善，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



孔子像



孟子强调了教育在个体后天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在“向善”的根基上，对人进行必要的道德教育，才能激发其内心的主观“行善”的心理情感。

性善论的人性观侧重于教化，即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虽然提出了“性恶论”，但他认为，人之所以有“善”，那是人为的结果，是在后天环境的影响下，通过教化和学习而形成的。

可见，无论性善还是性恶，官德教育之于廉政建设都是必要的。

史海镜鉴

在我国历史上，曾涌现出一大批清廉守正的廉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小就受到严格的道德标准的教育和熏陶。明朝的朱裳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朱裳是明代沙河人，祖籍邢台，字公垂，号安贫子、安斋。

朱裳的父亲朱风非常重视对儿子品格的教育。朱裳自小聪慧过人，行为大气。每次同伙伴在一起活动他总是站在高处呐喊“吾处不污也”的口号。在十四岁时，他正式进学堂读书。他家生活条件并不富裕，但他能节衣缩食刻苦学习，成绩相当优秀，当时的顾御史非常器重他，从生活上施以资助。后来他将朱裳推荐到翰林院崔铎那里。再后来，朱裳凭借高尚的品德和勤奋努力，终于登进士第，被朝廷授予御史之衔，进都察院。

父亲朱风让朱裳从小受到正统的教育。因此，朱裳向往尧舜盛世，佩服孔子、颜回的高尚情操，痛恨邪恶，正直不阿。他在山西（或说河南）巡察盐务时，宦官钱宁派人贩卖私盐，牟取暴利。那时正值宦官当政时期，钱宁是明武宗的干儿子，特务组织锦衣卫的头子，是权倾朝野、万人侧目的人物，但朱裳却依法办事，坚决查禁了他们贩卖的私盐。

朱裳在巡按山东时，碰到御史王相因为得罪了宦官黎鉴而被诬下狱之事，朱裳在查明了真相后，直言上疏，陈述王相的正直及其所蒙的冤屈，弹劾黎鉴的八条大罪。最终虽没能为王相平反，但也使减轻了他的刑罚。后来，山





东发大水，淹了成武、单县二城。朱裳经实地考察，提出了建议，改筑了城池。

1523年，朱裳被提为温州兵备道（今浙江温州、丽水一带），不久，改任浙江副使。后来朱裳的父亲也被朝廷授予官职，人们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位父亲的简朴作风，比他的儿子朱裳更为高洁。朱风不仅自己省吃俭用，而且对儿子要求十分严格，一再教导朱裳要以先贤圣人为榜样，永葆清操，让他不要惦念父亲，自己虽老，别无他求，一碗饭、一身衣、一床被子足矣。同僚看朱风的衣服实在太破旧了，便利用祝寿的机会给他送了一件新衣，但被朱风坚辞谢绝。父亲的言谈举止继续教育着儿子廉洁、严谨地处事待人。

朱裳以清贫为乐，年轻时自号“安贫子”。当官后，他一直让妻子亲自下厨，饭菜十分简单，几十天都不见一次肉，同僚笑送他“长斋”的雅号，他听到后索性把自己的号改作“安斋”，即“安于吃斋”之意。他在外为官多年，没为家里添置一亩田，没有翻修一间房，家中仍是“草舍席门”，“一如寒士”。

朱裳在朝为官，不私权贵、任人唯贤、一心为公，在当时的政界很有些名气，给事中刘清扬举荐全国清正大臣七人，朱裳名列其中。



得失点评

人性不管是善是恶，都要经过教化才能为善。道德教化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它可以通过个人良好私德的养成转化为社会公德，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道德教化所产生的社会评价具有极强的社会导向性，是使官德规范发挥社会调节作用的杠杆。这一作用是法律无法替代的。

轶闻遗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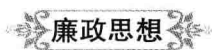
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反省自己的御用文书，但除了少数帝王能反省自己外，大多数帝王是不会认错的，要是有大臣要求他们“罪己”，有的人是会倒霉的。比如：明朝武宗时的“安贫子”朱裳，他做御史时，就顶皇上的亲信钱宁牟盐利之求于前，辩前御史王相冤狱于后。待皇帝朱厚照从宣府游玩归来，朱裳就请朱厚照下“罪己诏”，新庶政，以结人心。结果朱厚照根本不听。好在朱裳没受什么打击报复，另一位御史陈察就没那么幸运了。



宁王朱宸濠趁武宗朱厚照荒于政事，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扯旗造反。朱厚照率兵出征，可谁知行到半路王守仁已经平定了叛乱。朱厚照竟然将朱宸濠重新释放，由自己亲自再将他抓获，然后大摆庆功宴，庆祝自己平叛的胜利。之后他就逗留江南肆意玩乐。御史陈察就要这位皇帝下“罪己诏”，结果招来“夺俸一年”的处罚。



2. 廉政道德的第一要义是“廉耻”二字



传统廉政思想中有“廉者必知耻，知耻则能廉”的说法，认为廉政道德的第一要义是“廉耻”二字。由羞耻心而自律，人的行为即可符合道德，事事合宜。

我国从西周以来的历代伟大的思想家都把“礼义廉耻”四字作为治国的大纲，视其为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在“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是至为重要的，孔子曾说“行己有耻”；孟子也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羞耻之心，义之端也”。欧阳修认为“廉耻，是立（做）人之大节”。康有为则讲“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这也是说纠正风俗，要从知耻做起，让社会上每个人都有羞耻之心，社会就会有希望，许多新事物、新风尚的推行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墨家也认为，廉者知耻，也就是说，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所不当，内心会感到惭愧，也就是墨家所说的“廉，作非也”。廉，不在于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否有过错，而在于有了过错就能有所畏惧，知耻即改。值得注意的是，墨家又特别在两种情况下讲“廉”。其一是认为贫穷的时候要知廉；其二是认为当官吏的时候要知廉。《墨子·修身》告诫“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作为一个君子，人穷志不穷，不能妄取，生财要有道。《墨子·明鬼下》批评“吏治官府之不洁廉”。官吏应该廉洁奉公，是墨家所强调的。





史海镜鉴

廉政建设，需要从教化官民知耻开始，一旦有了羞耻之心，社会上的道德建设也就开了一个头。如果官民的廉耻之心淡薄，腐败现象将会蔓延。

康熙两朝时，举朝视贪腐如仇敌。到了乾隆中后期，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仅仅十余年，乾隆时期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甘肃冒赈案就是典型的代表。



乾隆皇帝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因不满清朝政府的民族歧视和压迫，率撒拉人、回民起事反清，进逼兰州。乾隆皇帝惟恐兰州不保，急调连城、凉州、陕西等地援军进剿。数万官军会聚省城，军费兵饷成了大问题。由于官军不能速胜，乾隆震怒，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一时甘肃地方官员惶惶不可终日。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向皇帝表示，愿意捐出四万两，以解燃眉之急。

聪明反被聪明误。读到这个奏折，乾隆的第一反应不是大加赞赏，而是心中一愣。甘肃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穷省，官员收入很低，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不久，乾隆又来自甘肃的奏报中得知当地并无旱灾。

乾隆在布置战事的同时，派人密查王廷赞的家产来源。一查之下，甘肃冒赈案迅速败露。

原来，清代在甘肃曾实行过“捐监”。所谓捐监，就是凡愿意取得国子监监生资格的读书人，须按规定数目向当地官仓捐交谷粮，遇到灾荒即用这些粮食赈济灾民。后来“捐监”一度停止。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后，以甘肃仓储不足，可用“捐监”粮米赈济灾民为由，说服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经勒尔谨奏请清廷获准，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又开始在甘肃各地开捐。

但这次开捐，王亶望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办法，让监生将应捐豆麦折为白银，改变“原令只收本色粮米”为“私收折色银两”。这样，粮米变成了白银，为王亶望及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王亶望调蒋全迪为兰州知府，专门办理“捐监”事务。蒋全迪完全按照王亶望的意图办事，将私收的白银借灾赈的名义任意开销，从中取利。蒋全迪与王亶望商议，为各县预定灾情，按照各县报灾的轻重，定出收捐数额，由藩司衙门预定份数发单给各县，令各县照单开赈，这就是“冒赈”。

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亶望不断地上奏朝廷，说甘肃又发生了天灾，他办理捐粮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灾民，灾民如何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纷纷称赞大清王朝好。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因王亶望办理捐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

